

政策·對策

宋代政治史探索



黃寬重

千年前的宋代人，和現代人的生活型態一樣，日常種種都和政治脫離不了關係。在宋代，國家並非政治運作的唯一中心，不同社會成員因地因時所產生的制宜對策，也在其落實國家政策制度的同時，呈現出傳統中國意料之外的政治生命力。

本書榮獲

國科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補助出版

中研院叢書

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New Perspectives
on Song Political History

黃寬重 著

中央研究院
聯經出版公司

序

在國際宋史研究領域中，尤其在南宋史方面，黃寬重教授無疑居於領導地位。

從學士到碩士的求學時期，寬重就以南宋末年與金、蒙關係的論文嶄露頭角；博士論文探討南宋時代的義軍，奠定他在南宋史學界的名聲。其後從宋金關係、宋蒙關係、金朝到宋的歸正人、地方武力，轉而專注於南宋地方社會與士人家族的研究，他都發表了重要的論文和專著。

寬重的學術成就，一方面來自孜孜不倦地讀書和參考前人之作，從而發現新的研究課題與途徑，因此能夠發人所未發，如探究官員、地方勢力和胥吏等推動基層社會運作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源於窮盡現存文集及廣泛發覺新資料，因此能夠知人所不知，如發現宋代印刷術的確實證據。這本《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則是這兩方面達到高峰的作品，也是他多年來研究工作的精華。書中開啓了討論地方與中央信息溝通和互動的新途徑，呈現出南宋社會組織與發展成爲宋以後基層社會的模式，可以說是研究南宋地方社會和家族的典範。

回顧從寬重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起，就和我有共同的研究興趣。四十餘年來，在我教學相長的漫長生涯中，目睹優秀學者的成長和光大，是最值得驕傲和慶幸的事。在此我還要提及他曾協助先父與我出版《食貨月刊》，由衷感激他任事細心負責、任勞任怨。謹以這篇序文，作爲與寬重最深最久、誼兼師友的紀念。

目次

Table of Contents

序(Foreword) (陶晉生).....	i
導言 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	1
Introduction: "New Trends in Institutional History and Their Bearing on a New Political History -- Some Possibilities for Song Dynasty Political History	
第壹編 中央集權下的基層權力結構.....	15
Section I: The Structure of Local Power Under the Centralized State	
第一章 沿唐變制——五代巡檢的轉型與特色.....	17
Chapter On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ilitary Inspector <i>xunjian</i> in the Five Dynasties	
第二章 縣邑職役——宋代弓手體系的沿革考察.....	67
Chapter Tw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ystem of Local Police <i>gongshou</i>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第三章 近民作縣——基層社會的權力結構與運作.....	87
Chapter Three: The Operation and Power Structure of Local Society at the County Level	
第貳編 地方勢力與政治適應.....	119
Section II: Local Powers and Political Compromise	

第一章 洛陽豪雄——兩宋之際洛陽地方武力的國家認同·····	121
Chapter One: The State Identity of Local Military Powers in the Luoyang Area in the Northern-Southern Song Transition	
第二章 四明風騷——宋元時期四明士族的衰替·····	139
Chapter Two: The Decline of Literati Families in Mingzhou During the Song and Yuan Periods	
第叁編 政局變動與訊息流動·····	171
Section III: The Circulation of Information During Times of Political Crisis	
第一章 令決於中——北宋晚期程氏父子對廣西的經略·····	173
Chapter One: The Management of Guangxi by Cheng Jie and Cheng Lin in the Late Northern Song	
第二章 庶無稽遲——宋、蒙廣西戰役的軍情蒐集與傳遞·····	195
Chapter Two: The Collec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in Mongol and Song Warfare in Guangxi	
結論(Conclusion)·····	231
後記(Postscript)·····	241
附錄(Appendix)·····	1
參考書目(References)·····	245
索引(Index)·····	265

導言

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

20世紀初以來，政治史長居中國史研究的主流地位。早期政治史研究著重上層政治結構與政治發展，諸如典章制度、政治事件、變法、黨爭、政局變動、政治人物與集團等面向都是常見的主題。後因史料刊布及歐美社會科學理論引進，新的研究議題與領域日漸拓展，學者的研究眼光開始從中央、上層、典章制度，轉向地方、基層、庶民生活。社會、經濟、文化等歷史研究議題成爲學界新寵，發展日益蓬勃，反觀政治史研究卻漸形萎縮。

在政治史初逢挑戰之際，宋史學界已有學者嘗試透過各種視角，分析政治過程與空間，動態闡述決策的形成與落實，以發掘具有新意與啓發性的政治史議題。2001年，中國大陸宋史學界提出「活的制度史」，進一步指出制度史研究應把握制度變遷與背後複雜的人事權力關係，而非視制度爲孤立於政治運作與人事之外的靜態產物。在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下，已有幾部成功的著作問世，並在宋史學界引發廣泛迴響。繼此以降，在研究視野、方法推陳出新的學術環境裡，宋代政治史未來的研究趨向爲何，有哪些具體的研究觀點、範疇與成果，又如何能保持競爭力，值得研究者關注。

一、宋代政治史研究的興盛階段

20世紀初，符合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史研究方才展開，政治史研究已廣受學界重視並位居主流，是爲政治史研究的興起階段。歷史研究在此階段因出版典籍

不多，重要圖書不易使用，加上討論上層政治結構、人物與政治發展等問題，僅需結合重要經典及二十五史等正史典籍，即能提出新見，成一家之言，故投身研究者眾多，成果輝煌。在偏愛研究盛世典制的學術氛圍與史料局限下，學界研究雖有重漢唐輕宋明的現象，然而第一代宋史學者仍為宋代政治史研究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如聶崇岐〈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與〈論宋太祖收兵權〉、張蔭麟〈北宋的外患與變法〉、錢穆〈論宋代相權〉，以及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與〈宋史刑法志考正〉等著作，透過文獻考索的實證方法，對史志與制度翔實地考訂與探究，是早期研究宋代政治制度具有代表性的作品¹。此外，變法、黨爭、政局變動、集團與政治鬥爭，以及政治人物的作為與歷史定位等議題，也都是早期政治史研究的熱點，宋代的皇權與相權、強榦弱枝、重文輕武等，更是討論中國歷史轉型的重要課題。

不過，此階段的宋史也如同其他斷代研究，明顯獨重開國立制階段與變法黨爭，對北宋晚期以降，特別是南宋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多所忽視。所以如此，一來是研究者多認為開國時期的規劃與作為，決定了一朝格局，後繼者多是祖述舊章，無關宏旨，故疏於論述。二來，研究資料也限制了討論的開展。北宋一朝除《宋史》之外，尚有編年體的《續資治通鑑長編》，該書保留北宋中晚期以前的詳細史料，裨於學者掌握興革變化；南宋除《宋史》與記錄高宗一朝歷史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外，缺乏完備的編年史料，其他文獻又殊為零散，不易蒐集整理，一時難以掌握梳理。再者，在追求盛世宏規的國情下，南宋往往被視為偏安小朝廷，除了悲劇性英雄岳飛、文天祥，與朱熹等理學大儒等歷史人物外，其他課題鮮受學者青睞。

1 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0本(1948出版，1971·6再版)，頁433-593；〈宋史刑法志考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本(1948出版，1971·6再版)，頁123-173。錢穆，〈論宋代相權〉，《中國文化研究彙刊》2卷(1942·9)，頁135-150。聶崇岐，〈宋代府州軍監之分析〉，《燕京學報》29期(1941·6)，頁1-56；〈論宋太祖收兵權〉，《燕京學報》34期(1948·6)，頁85-106。張蔭麟，〈北宋的外患與變法〉，《思想與時代》5期(1941·12)，後收入《張蔭麟文集》(台北：中華叢書委員會，1956)，頁418-429。

台灣的宋史研究開展於1949年國民政府播遷之後。當時大量典籍文獻隨國民政府來台，典藏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故宮博物院與台灣大學四個機構。許多避秦抵台的歷史學者就在艱苦的環境中，為台灣的中國史研究揭開序幕。惟此時期受限於皮藏條件，一般學者難有機會利用這些典籍，故而整體研究環境和風氣仍與在中國大陸時期無異。影響歷史學研究甚深的馬克思社會經濟史觀，也因台灣政治環境敏感而禁絕，學界多遵循傳統的考證分析，此即被批評為缺乏理論的史料學派。此時，各大學歷史學系的課程講授及研究仍以政治史為主，焦點也偏重北宋史。不過，相較於眾多大學歷史系所的政治史研究，政治大學的政治研究所的成果最為豐碩。該所以政治制度及其運用為主要探討方向，有較強的政治學訓練，並能參用政治與社會科學理論及方法，雖然研究取徑及史料運用與歷史學界不盡相同，史料爬梳與考訂亦不如歷史學界，但卻是跨領域研究的先行者。

二、台灣政治史研究的消退

台灣的宋代政治史研究歷經了研究焦點集中北宋，討論議題偏重政治事件與歷史人物探究的興起階段，至20世紀70年代起轉入消退階段。這與典籍大量出版與社會科學理論引進，關係密切。

1949年中共建政後，世界各國認識、了解中國的需求急切，積極開展中國學研究。國際學界視台灣所藏的豐富典籍為重要研究資源，台灣遂成為傳統中國文化最重要的對外窗口，大規模的史料編輯、翻印等出版工作於1970年代前後陸續展開。以宋史研究材料而言，除正史外，像《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名家文集、筆記小說，以及由趙鐵寒教授主編的《宋史資料萃編》，均大豐富了研究資源，連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與議題²。

同時，受到歐美學界的影響，社會科學理論也浸漸主導台灣的中國史研究取

2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台北：世界書局，1961)。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台北：世界書局，1976)。趙鐵寒主編，《宋史資料萃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向。歐美學者關心中國的歷史發展與現代化，或源於其對自身社會歷史發展的觀察，或擷取自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社會學、人類學、經濟學、文化學等觀點，都是觸發其靈感的來源。透過旅美學者的轉介，各時期流行的理論和方法先後引進，如計量統計、社會流動，都曾或深或淺地影響台灣的史學研究，使歷史學研究取徑多樣化，觀察詮釋也趨於多元。不同學科間的激盪刺激，使新的議題不斷出現，帶動了新的研究方法，也擴展了新的研究方向。1970年代以降，史學研究重點不斷改變，如以個別人物為中心的學術思想史、強調量化統計與理論的社會經濟史，著眼於庶民生活的文化史與後現代研究等，都曾在史學界引領過一代風騷。

研究材料的開拓、數位資料庫的出現，加上一波波不同領域社會科學理論的影響，歷史研究議題不斷擴大、分殊，研究範疇也由原本的中央、上層，向地方、下層、庶民推展，面向漸廣。史學研究的熱點日益被思想史、社會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形形色色的課題取代。在此背景下，政治史論著數量雖未減少，但相較於各類新生議題，卻顯得多欠缺新意，因而傳統的典章制度考訂或政治事件探究為主的政治性議題，不再受到學界關注，政治史的重要性漸漸被沖淡、稀釋，甚至有消退之勢。這種現象從近十年來台灣史學界所發表的論文，以及各大學相關系所開設的課程內容，可以清楚顯現。

研究取徑和書寫技術的改變，與政治史研究熱潮消退相繫。傳統歷史研究側重對史料的蒐集整理與考訂解讀，留心對時空背景的整體掌握，著重變與常之間的關係，在數據分析之外，更看重敘述。這樣的治學方式強調文史不分家的涵養，研究者必須具備扎實的閱讀與文字掌握能力，善於參照各種不同性質的史料，同時廣泛涉獵各類知識，充實歷史地理、年代、職官、版本目錄等基本素養，才能深透。也就是說，傳統中國的歷史學被視為人文學樞紐，是一門綜合性的學問，學科邊界並不明顯。

然而，傳統的「學問」在現代學科劃分的影響下，各學門間分際凜然，非但訓練與取徑各有不同，更紛紛強調創新、注重理論，學術專業性日益強化，尤其仰賴大型資料庫查索資料，用大量數據說明立論的完備性與嚴謹度，藉以建立具學術說服力的觀點，人文學科遂日漸趨近自然科學。強調專業，即使各學科間的

疏離感加遽，造成歷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隔閡，歷史學傳統的討論方式也因難以迎合現代學術標準，研究成果受到其他學科的貶抑，漸漸退居學術邊緣。甚者，歷史學者借助社會科學理論的同時，無形中也放棄了傳統史學思考、分析、敘述與整體關照，將歷史學拆解成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不同研究類型，以致各類型研究間隔行如隔山，許多課題若不曾涉足，幾乎無法深入評論。

鑑於政治史研究的消退、傳統歷史書寫技術後繼無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2009年春天所舉辦的歷史研習營，就特別強調政治史研究，及傳統歷史書寫技術與訓練的重要。這個例子結合上述歷史系缺乏政治史課程的現象，可以反映政治史研究在台灣面臨的人才斷層與研究發展的困境。

三、中國大陸宋史學界「活的制度史」之提出

中國大陸歷史學界度過了1960-70年代政治掛帥的幽暗期之後，到1980年代，配合改革開放的步伐，歷史研究大幅躍進，面向拓展，質量俱增。其中，宋代政治史研究繼承了中國史典章制度堅實的考訂傳統，成果尤為顯著。如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龔延明的《宋史職官志補正》、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與朱瑞熙《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香港方面則有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宋樞密院制度》、《宋宰輔制度研究論集·第一輯·宋宰輔兼攝制度》以及《宋宰相表新編》等四部力作，都是考訂與增補宋代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³。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虞云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及前述《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則

3 龔延明，《宋史職官志補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何忠禮，《宋史選舉志補正》（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中華書局，1983）。李昌憲，《宋代安撫使考》（濟南：齊魯書社，1997）。白綱主編、朱瑞熙著，《中國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梁天錫，《宋代祠祿制度考實》（香港，1978）；《宋樞密院制度》（台北：黎明文化出版公司，1981）；《宋宰相表新編》（台北：國立編譯館，1996）；《宋宰輔制度研究論集·第一輯·宋宰輔兼攝制度》（香港：中國佛教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6）。

在制度考訂之外，兼及其運行機制與特點⁴。

此一榮景，反映中國大陸學術重建的勁道與成就，與同一時期台灣宋代政治史研究消退的情況，呈現明顯對比。然而，199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隨著研究資源日增，對外交流日盛，加上各類社會科學理論的觸發，新的研究議題擴展迅速，政治史再難獨重。復以中國大陸政治史研究取徑受限於既有框架及訓練方式，或一再重複相同的史料及議題，或無法跳脫靜態的制度梳理，就數量而言，研究成果雖有明顯成長，但往往缺乏新見，品質難以提升。到世紀交替之際，政治史研究較之於其他領域的興盛，更是窘態日見。

爲了重振宋代政治史研究，並調整發展方向，中國大陸青壯輩宋史研究者於2001年邀集海內外學者，在杭州召開「近百年宋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會議針對制度研究發表17篇論文，除部分以宋史爲例，討論制度史研究中具有普遍意義的問題外，其餘12篇論文分由不同側面，回顧與反思百年來的制度研究。這些論文在2004年，由浙江大學包偉民教授集結成《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一書出版⁵。

該書各篇論文詳細檢視不同議題的宋代制度研究，既總結了百年來制度史的研究成果，也深切地反省了過去的缺失與不足，希望藉以改變政治史既有的研究型態，重新出發。該書呼籲學者應跳脫制度闡釋的藩籬，由以往強調宏觀、靜態、脫離歷史實際的文本主義制度史，轉而重視制度的動態發展與運作過程，嘗試把握制度變遷與背後複雜的人事權力關係，以更貼近歷史實情，總名之爲「活的制度史」⁶。制度不外乎人事，政治體制的運行並非僅由人單純地遵行、符合制度規範，更是制度與人事之間的相互爲用。當制度建立之後，仍須透過人事從中解釋、運作，乃至創造新制度的發展空間；倘若太過單一、靜態地看待制度，未能與政治、社會的發展相結合，制度史將淪爲孤立的考證，而非具有歷史意義

4 鄧小南，《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虞云國，《宋代臺諫制度研究》（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

5 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6 包偉民，〈走向自覺：關於深入拓展中國古代制度史研究的幾個問題（代前言）〉，收入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頁7。

的學術問題。

2001年會議的與會者多是中國大陸宋史學界具有代表性的學者，經過反省、檢討並調整研究取徑後，宋代政治制度研究的整體情況已有所改變，其中以鄧小南教授指導的博士生論文最為具體。這些作品著重闡述制度形成、推動與執行過程中，外在環境變動與人事權力關係所造成的影響，不再將制度視為客觀獨立且凝止不變的存在。論述也多能兼顧動態發展過程與人事運作的角色，將研究範疇擴及參與政治運作的各類社會組織與力量，以及文化發展與政治情勢之間的互動關係等，使政治史研究不再偏於上層、中央政治結構，轉而注意下層、地方性，乃至上下溝通等議題。

此一發展趨向可以說明，推動活的制度史研究，實有助於中國大陸宋史界走出舊有研究框架，對宋代政治有更整體的了解。不過，活的制度史只是活絡政治史研究的途徑之一，若期待政治史研究能改換新貌，仍需有新的思考，並結合其他學科的研究成果，形成跨越不同領域、不同層面的整合性觀察，使其內涵更為豐富多元，才能讓政治史研究得以在眾多學術領域的競爭下，開展新猷。

四、邁向新的政治史研究

早在政治史初逢挑戰的1970年代，個別海外宋史研究前輩嘗試透過不同視角，發掘具新意的政治史議題，為政治史研究開展新的發展方向。

首先對政治史提出反省的，是已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劉子健教授。劉教授早年修習政治學，專攻宋史，並教授中國現代史，其以政治史為研究主軸，提倡新視野、新方法，對宋代政治人物如范仲淹、歐陽修的討論，都有別於傳統對歷史人物的研究⁷。劉教授曾在1960-70年代，分別於港台發表如〈背海立國與半壁山河的長期穩定〉、〈包容政治的特點〉、〈王安石、曾布與北宋晚期官僚的類型〉、〈南宋君主與言官〉，與〈略論宋代武官群在統治階級中的地位〉等多篇論文，從宏觀角度討論南宋立國環境及政權特色，論點雖仍待深化充實，但

7 劉子健，《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香港：新亞研究所，1963）。

明顯擺脫傳統政治史的論述方式，重視解釋與新觀點的提出，頗具啟發性⁸。惟當時台灣與中國大陸歷史學界，缺乏這樣重視思辯的訓練，復以劉教授在美執教，其研究方法只能對個別學者產生影響，未能帶動整體華人學界政治史研究的新風⁹。

1980年代末，日本廣島大學寺地遵教授所提出的「政治過程論」，也可視為開展政治史研究新視角的先驅。日本學界的宋史研究，長期受內藤虎次郎、宮崎市定等學者的宏觀政治學、唐宋變革論影響，多以中央政治為討論中心，關注君主獨裁政治論，且過於偏重北宋時期。有感於此，寺地遵教授特別以南宋為研究對象，提出政治過程論的觀點，以微觀視角考察南宋官僚機構中，由皇帝到最下層的連線間所存在的勢力集團，及圍繞國家決策所發生的衝突、抗爭，也就是將中央與地方聯繫起來，以分析政治過程¹⁰。其代表著作就是《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1988）一書，該書於1995年譯成中文¹¹。

該書的出版對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影響頗為顯著，後繼者對此觀點的闡述，也時有新見。如大阪市立大學平田茂樹教授，便曾以政治空間(場)的文書傳遞，以及議與對策等議題，來闡述宋代政治決策的過程¹²。不過，直到近年，寺地教授的論點才因平田教授與余英時教授在著作中的引介，而廣受華人學界重視。此一強調過程的動態研究，也表現在鄧小南教授發其端、個人繼其後的文書傳遞與政令運作的研究項目中。這一系列的相關研究，不僅注意政治制度的功能與運作過程，也關注到資訊取得對帝國統治、士人溝通的關係，讓制度既與人事

8 上述多篇論文收錄於劉子健，《兩宋史研究彙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柳立言先生是劉教授的高足，其所著〈高宗陰影下的孝宗〉即體現了劉教授所揭示的研究觀點與風格。柳立言，〈高宗陰影下的孝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7本3分（1986·9），頁533-584。

10 平田茂樹，〈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評〉，收入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頁43。

11 寺地遵著，劉靜貞、李今芸譯，《南宋初期政治史》（台北：稻禾出版社，1995）。

12 平田茂樹，〈日本宋代政治史研究述評〉，收入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90-2000）》，頁48-58。

相結，形成動態發展，且能從政治運作的角度，賦予原屬各專門領域的學術議題新的內涵。具體成果見於鄧小南教授主編的《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以宋代為重心》一書¹³，及《漢學研究》「宋代的信息傳遞與政令運行」專輯¹⁴。

繼中國大陸宋史學界提出活的制度史論點，以活絡政治史研究之後，近年出版的兩本宋代政治文化史專著：余英時教授《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及鄧小南教授《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在宋史學界中引發了廣泛的迴響，更直接觸發了政治史研究的新發展方向。余教授研究涵攝經濟、學術、思想等諸多領域，並長期以思想文化、宋明理學及個別思想家哲學內涵為主要探討課題。《朱熹的歷史世界》一書以思想史內容的政治解讀為主要取徑，關注孝宗朝著名思想家所形成的道學集團，及其因關切國是所展開的活動，強調綜合文化史與政治史研究，注重兩者的互動關係¹⁵。鄧教授大作則在探索宋代官僚制度之外，進一步闡發宋史學者所熟知的祖宗之法如何為北宋歷朝君臣所利用，又如何影響當時政局，細緻勾勒出政治過程、制度運作與人事互動間的連動關係¹⁶。上述兩本專書幾乎同時以不同取徑，重新詮釋了宋代政治史的文化意涵，在學界紛紛檢討如何在傳統的典章制度之外，尋求政治史研究新出路之際，遂成為宋史學界重啟政治史研究最直接的觸發力。

五、宋代政治史探索——本書主題說明

在學術風潮的轉折起落外，個人的成長經驗與學史歷程也讓我對宋代政治史研究有不同的體會與想法。

13 鄧小南主編，《政績考察與信息渠道——以宋代為重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14 黃寬重主編，《漢學研究》27卷2期「宋代的信息傳遞與政令運行」專輯（台北：漢學研究中心，2009·6）。

15 余英時，《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03），〈自序〉，頁1。

16 鄧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序引〈問題的提出〉。

我成長於台灣的艱苦發展階段，當時國民政府甫退遷台灣，政治、社會均受到巨大的衝擊與挑戰。在國際形勢變幻莫測、兩岸緊繃對峙的備戰情境下，台灣政局風雨飄搖。少時的我身處其間，對內外情勢變化非常敏感，甚至有個人生命與國家安危相繫、家國一體的強烈感受。另一方面，當時的台灣社會正是新舊傳承與轉變的階段。傳統文化仍主導著社會運作，家族活動、鄉里互助是日常生活的基石；國家則透過行政體系與法律制度，深入百姓的生活，展現其政治力量。兩股勢力在基層社會交會，身處其中的個人無時不感受到兩者的力量互動、消長與變化。這種經驗讓我一生至今都關心台灣的前途、關切現實環境的整體發展，也成為我學習歷史的啟蒙力量。

古今相證的史學訓練更讓我對經由現在觀照過去、透過過去了解現在的觀史、治史法則，另有一番體悟。大學時期，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雖相繼引入台灣，但校內可資閱讀的西方圖書不多，亦欠缺適當引導，我所接受的訓練仍較著重傳統的深度研讀。時適蒙東海大學中文學系孫克寬教授指引，我開始研讀南宋文集。從史料閱讀中，我既了解到歷史現象無法以特定社會科學理論一以概之，也體認到歷史人物或事件發展，與大時代變化間關係多重而綿密。

本著這樣的認識，我總嘗試將歷史經驗與現實環境結合，從中尋求靈感，並透過現實事務理解過去，分析影響歷史發展的多重因素；研究過程中，也特別關注政治、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個人與群體的適應、出路與最後的命運。我注意到宋、金、蒙三勢力興替之際，其政治環境與當時兩岸情勢多有可扣合之處¹⁷，進一步引發我探討南宋歷史的動力。我曾討論過的理宗時代和戰、邊防與流民三項重要國是爭論，以及南宋義軍、和戰與南北人、歸正人、「害韓殺岳」等收兵權與文字獄問題，乃至李全父子和馬擴等亂世英雄人物等課題，都是受現實環境經驗觸發，進而探尋其歷史脈絡所發展出的研究議題¹⁸。這種古今對話、相證的

17 孫克寬教授的研究著重在元代史、宋元道教、詩學三個範疇，同時投入古典詩詞創作與新式散文寫作。詳見許建崑，〈孫克寬先生行誼考述〉，《東海中文學報》18期(2006·7)，頁79。

18 黃寬重，《晚宋朝臣對國是的爭議——理宗時代的和戰、邊防與流民》(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文學院，1978)；《南宋時代抗金的義軍》(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從和戰到南北人：南宋時代的政治難題〉，《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學術

作法，在中外前輩史家的經驗中，所在多有¹⁹。

閱讀清末民初人物傳記及名家回憶錄，則是我課餘最大的嗜好之一，研究宋代地方武力與地方軍的靈感便得之於此。我在其中觀察到，從清末到抗戰期間不少地區仍存在中央政府不能有效控制的地方勢力，並由此聯想七、八百年前的南宋時代，表面上朝廷承繼北宋強榦弱枝政策，實際上應仍有地方武力的存在。此後，我便特別留意史料中的南宋地方軍、地方武力，先後撰寫了多篇論文，最後集結成書²⁰。該書討論重心雖是區域武裝力量，但中心關懷則是從整體性看南宋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以及其中所反映南宋具包容性的政權性格。沒有這樣的機緣，很難想像在史料上偶然出現的飛虎軍、摧鋒軍、左翼軍、茶商軍、兩淮山水寨等名詞，有何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足以成為具有時代特色的研究議題。

我因從事地方家族、地方軍與地方武力等研究，常被視為宋代社會史或軍事史工作者。然而，我卻對政治議題較富敏感度，習於將歷史現象與政治問題連結思考，研究內容也因此帶有較強的政治觀察，同時注重整體現實環境的長期發展。我從自身的治史經驗，體會到研究者如能留心觀察，進而思考現實社會中各種現象的歷史背景，並透過閱讀培養史料敏感度，蒐集篩選有意義的材料，往往就能逐步串聯出具有歷史意義的研究課題。本書討論的中央集權與基層權力結

(續)——

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5)，頁169-189；〈略論南宋時代的歸正人〉(上)(下)，《食貨月刊》7卷3期(1977·6)，頁15-24；7卷4期(1977·7)，頁22-33；〈從害韓到殺岳：南宋收兵權的變奏〉，《國際宋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史學系，1988)，頁517-534；〈秦檜與文字獄〉，收入岳飛研究會編，《岳飛研究·第四輯·岳飛暨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52-172；〈割據勢力、經濟利益與政治抉擇——宋、金、蒙政局變動下的李全、李璫父子〉，《第一屆全國歷史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台北：台灣大學歷史系，1996)，頁87-106；〈馬擴與兩宋之際的政局變動〉，《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1本4分(1990·12)，頁789-808。

- 19 陳寅恪的著作有不少對現實的關懷，是學界熟知的。法國年鑑學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各·勒高夫(Jacques Le Goff)研究歐洲中世紀歷史，也多運用這種「時代錯倒法」。見鄭智鴻，《雅各·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學》(台北：唐山出版社，2007)，頁43-44。
- 20 黃寬重，《南宋地方武力：地方軍與民間自衛武力的探討》(台北：東大圖書公司，2002)。

構、地方勢力與政治適應、政局變動與訊息流動等三個主題，都呈現此一特質。

本書題為《政策·對策：宋代政治史探索》，意在結合現有成果，回應學界近年對政治史研究的討論，也呈現個人歷史研究的政治觀察視角。以往的宋代政治史研究多著眼於該朝中央集權政體，以朝廷作為授令者，視政策、制度乃至政令為整體的靜態架構，其間縱有階段性差異，但研究者對多數時期的制度描述仍平板而一貫。然而，研究者若能跳脫傳統偏重典章制度的討論方式，以兼顧基層的角度考察宋代政治與社會秩序的形成過程，往往能描繪出更為生動、深刻的政治史圖像。以「政策·對策」為題，就是希望點出政治發展或制度形成，或許不宜再以中央主動授令、地方被動而回應的劃分方式，將中央政權象徵的政治力與地方所呈現的社會力，視為彼此對立的兩種力量，也不宜再視政治發展為施令—受令—結果的單向式關係。

政策與對策之間，存在多種互動交融的動態過程。首先，授令者因應內外情勢變異，也存在尋求應對之策的必要，不論政策、制度與政令，從制訂到執行都顯現其機動性。就有宋一朝而論，其所面對的外在政權強弱有別，國內的政治角力消長不一，宋廷所制訂、推行的各項政策，必須持續回應國內外情勢變化，有所調整。以廣西經營為例，北宋時期四鄰勢力介入廣西尚淺，情勢單純，宋廷得以強勢經略此西南邊陲之地，日後卻因國內新舊黨爭難平，由經略趨於保守；南宋晚期蒙軍經由大理、安南進犯廣西，戰況危急，宋廷對廣西雖由放任轉為積極布防，然宋蒙之間戰線過多，宋廷只能選擇集中資源確保荊湖防線安全。兩宋的戰略差異，反映政權因應外在情勢的因時制宜。

其次，中央與地方的政令授受關係是雙向互動，亦即政令、政策，乃至國家發展走向，實際上也因受令者不同階段的反饋而持續調整。如晚唐五代具私人武力性質的弓手，到宋代改隸縣尉，並有明確的組織與職能規範，代表朝廷在地方執行公權力。然而，隨著時局環境變化，弓手成為地方職役，且轉由當地人士充任，其在執行政策時，便不再單純是中央朝廷政治力的展現，也有代表在地利益與公權力周旋拉鋸的現象。弓手制度從制訂到推動落實，反映地方社會服膺中央政令的同時，也因為直接參與制度的運作，而逐漸影響轉化其內涵。

再者，受令者對政權遞嬗與政策制度的因應，除了及時而有形的行動之外，

也可能化爲心態或意識的轉變，從而影響政治利益關係與政治抉擇。如兩宋之際洛陽永安豪強孟邦雄，原是宋金亂局中效忠趙宋、守護皇陵的義師，及至女真在洛陽地區扶植劉豫政權後，孟邦雄爲求生存，只有改事劉齊，並爲之盜掘宋陵以輸誠。身處新舊政權交替之際，孟邦雄叛宋雖有違傳統忠義概念，卻是基於維護自身及當地的社會秩序所作的抉擇，對劉齊政權具穩定作用，也重新詮釋了忠誠的意義。

探討政治與社會秩序的連結和互動關係，需要在制度、規範之外，同時關注不同權力在面對不同時空的政治情境下，其制度轉變、結構調整與政治立場抉擇等種種過程，乃至其因應之策如何呈現當代的政治內涵，是本書的一項嘗試，而這三個討論的主題正是本人希冀藉由政治視角，重新整合個人軍事史、社會史、家族史研究，形成跨時段、跨議題的觀察，試圖開啓探索宋代政治史的另一扇門。

六、結語

當因新方法或論點的出現，帶動學界新的研究風潮時，舊的議題與討論方式相對遭到忽視，影響力消退。政治史研究的起落轉折正是學術風潮移轉所致，這種情況也可以在西方歷史學發展演變看到端倪。歐洲以政治、軍事事事件敘述爲中心，呈現大人物、大事蹟的歷史寫作方式，經過啓蒙時代的衝擊，到19世紀逐漸出現民眾史、馬克思社會經濟史觀，以及魯賓遜(James Harry Robinson)提倡結合人類學等治史的新史學(New History)，長期獨霸的政治史面臨挑戰而明顯式微²¹。然而，政治史研究的價值雖一時受到挑戰，卻不代表政治不再是歷史研究的重要議題。姑以貶抑政治史尤熾的年鑑學派言之，該學派前輩史家雖將政治事件史貶至一文不值，但到第三代年鑑學派，學者在反對形式決定論的同時，也藉區域研究，重新關注政治史，甚至發展政治文化史。回歸政治史的轉變，乃至敘

21 彼得·柏克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1989》（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9-15。

述事件及歷史傳記的復興，說明在持續的衝擊挑戰下，研究者經過反省檢討，而將政治史視角拉廣，結合各領域研究成果，重新調整並催生出新的發展方向。

歷史研究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不該為學科領域界線所切割。討論歷史問題，特別是涉及政治時，尤應廣泛關照全局，兼顧社會、經濟與文化及各種時空因素，才能切近歷史的全貌。歷史研究若為迎合社會科學各專業領域而過度切割，非但將自外於歷史時空，更會因過度傾向社會學科，反而淪為其他學科的註解，卻又不易得到認同。政治史若要重新出發，實應整合不同學科的研究觀點，將過去被割裂為交通史、社會史、經濟史、思想史等類別的諸多成果，從政治運作的角度加以統合，重新賦予學術意義，才能豐富研究內涵，這也是個人撰寫本書的信念。

新的政治史研究是歷史學界面對挑戰與衝擊後所作出的反思、呼籲與調整，是一種由約返博的工夫。學術研究雖不斷推陳出新，但研究品質的高下優劣與新舊關係不大。推動新的政治史研究所揭示的「新」，用意在擴大視野之外，更關注回歸政治思維為主體，吸納其他領域的成果，以豐厚其內涵。從動態發展的觀點與政治運作的角度，觀察政治決策與人事關係的互動，賦予原屬各專門領域的學術議題新的內涵，對於開發政治史研究的視角有其助益。

若期待新的政治史研究能有不同於過去的成果，研究者必須加強意見交流，尋找可以探討的議題，結合興趣相近的學者，透過集體研究，形成研究團隊，才能發揮較大的研究效益。人文社會學科的研究，個人才學與創見固然重要，如果能進一步借重群體討論或集體合作的方式，對大型議題進行長期研究，不僅可以突破點狀的研究成果，創造局部優勢，影響層面也較為寬廣。這一點，法國年鑑學派推動的群體研究經驗，值得取法。當學界以篤實的治學態度，透過新思維與新取徑，重新揭示政治史的發展方向，圓滿不足之處，相信讓政治史研究既有新意又能求全，再度展現活躍的生命力。